

# 从“废品村”看城乡结合部的灰色空间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Grey Space in Rural-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the “Waste Village” in Beijing

陶栋艳 童昕 冯卡罗  
Tao Dongyan, Tong Xin, Carlo Ferri

**摘要：**城乡结合部往往是非正式就业的集聚地带，提供了底层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社会经济桥梁。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城乡结合部两个不同时期形成的“废品村”——八家和东小口——的实地考察和对比，力图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揭示这种城市灰色空间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在描述和记录实体空间变迁过程的基础上，阐释资本运动下不同主体对“废品村”的空间表征产生的影响，以及为空间改善所做的努力，从而构建这一灰色空间的多层次空间意义以及社会—空间相互塑造的机制。结论指出，“垃圾村”是城乡二元割裂的发展方式在城市边缘的一种景观呈现，重塑空间需要重视真正的空间使用者的需要，并从公共服务市场建构入手，改变城市废物管理的资本逻辑。

**Abstract:** Rural-urban fringe in metropolises is where informal employment assembles, which provides the entrance to cities for the migrant laborers from rural areas with low technical skills and capital. This paper provides tales of two waste villages in such marginal space in Beijing: Bajia and Dongxiaokou, with constant field studies. We summarize the patterns and rules of their spatial 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By illustrating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whole system, including migrant rural recyclers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agents, the multiple meaning of spa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of space is explained. Further, we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the social-spatial interac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grey space of waste village is a special embodiment of the distorted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mode, acting on the landscape of rural-urban fringe. The future transition of the waste village calls for a higher-level transition of the overall urban development mode. We propose reexamining the public value of resource renewal and valuing the demands of the space users,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capital logic of urban waste management and to reshape the urban space wit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关键词：**废品村；城乡结合部；空间生产

**Keywords:** Waste Village; Rural-Urban Fringe; Production of Space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关键技术研究示范”  
(2013BAJ13B00)

**作者：**陶栋艳，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taodongyan@gmail.com  
童昕，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tongxin@urban.pku.edu.cn  
冯卡罗，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系，博士研究生。carlo.ferri@ouce.ox.ac.uk

## 引言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化和城市实体建设的前沿，是“一面反映错综复杂的城市化过程的特殊镜子”<sup>[1]</sup>。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呈现出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强烈冲击，它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边缘形成的一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景观呈现。已有研究从空间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不同角度，对城乡结合部的独特发展机制和状态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sup>[2-6]</sup>。其中，项飏等人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20世纪80至90年代京郊形成的“浙江村”的研究，抓住了城乡结合部作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桥梁所具有的沟通城乡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理解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边缘所形成的具有专业化产业特征和紧密同乡网络的空间，具有启发性<sup>[7]</sup>。城乡结合部为外来人口提供了相对廉价的生产和居住空间，而紧密的同乡社会网络为之提供了进入城市的社会支持。相比受到研究者和城市管理者关注的浙江村，从事废品回收的“河南村”则显得更为边缘，所反映的城乡结合部的矛盾和冲突也更为尖锐和持续。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废物管理作为一种高度外部性的城市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法通过简单的管制而实现权力和责任的有效对价，由此产生的空间在形形色色的城乡结合部发展形态中，具有其独特形式和内涵，它承载了城乡二元发展、人地环境冲突，以及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多重矛盾，成为我们观察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良好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生活方式出现巨变，并带来城市垃圾管理模式的改变：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使物质极大丰裕，大规模生产—消费模式逐渐兴起，

居民日常消费的废物产出量激增；另一方面，传统的以再生资源回收为核心目标的国营供销社系统逐步瓦解，废品作为再生资源的经济属性与城市垃圾管理的公共服务属性难以清晰划分，形成了管理上的模糊地带。非正式的废品回收行业逐渐成为城乡二元结构下，缺少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最底层的渠道。“废品村”正是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景观：大量专门化的废品集散市场出现在城乡结合部，连接城市中走街串巷的废品收购，通过简单的分类变成有价值的再生原料，再输送到城市以外的生产区域。这些集散市场集交易、仓储、分拣和加工处理再利用等功能于一体，高度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地区，通过租用村集体土地，自发形成了一类专业化从事废品回收的独特城中村。

与正规而昂贵的城市垃圾管理系统相比，这些“废品村”往往没有空间使用的合法地位，回收分拣都依赖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操作。劳动专业化的聚集伴随着典型的同乡同业的就业区隔。以北京为例，非正式的废品回收从业者有90%以上来自河南固始，因此被很多社会学者称为“河南村”<sup>[8]</sup>。由于其外在景观所呈现的脏乱，以及居民混杂和高流动性带来的治安条件恶化，这类空间往往成为城市管理中的“灰色地带”——其存在获得暂时的默许，但始终处于将被治理整顿或拆除的状态下。随着城市的扩展，“废品村”总是被不断拆除，又不断向新的城乡结合部寻求村庄的接纳。

这种空间的形成与变迁，可以用“空间生产”理论中实体景观运动的多层次空间来阐释<sup>[9]</sup>。首先，现有废品集散市场在资本运动的作用下，以逐利为目的，实现废品回收产业链在“废品村”中所呈现的现实状态，这种状态受到更大区域范围的原料市场的影响，作为跨区域生产体系的微小环节，在市场供需和价格变动的波动中，维持自身的运作。在经济利益的趋势下，即使特定的“废品村”被整治拆除了，同样形态的废品村又会在类似的空间被一再生产出来。其次，城市管理者对高效的废物管理的认知，形成了城市规划和管理所期望实现的废物管理系统——整齐、清洁、高效、环保（往往昂贵）的现代化回收处理设施。最后，“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的是不同主体对这种空间的差异化理解，对空间再生产具有决定性影响，每一种阐释的背后，往往反映不同的权力诉求，引向不同的改造行动，最终塑造不一样的城市空间。

## 1 废品村的空间表征

### 1.1 研究区域

本文调查的两个废品村——八家村和东小口村——位于北京市北部，是北京城乡结合部上百个垃圾村中规模较大的

两个。

八家村隶属海淀区东升镇，位于北四环与北五环之间，地处海淀高校密集区，距离中关村3 km。八家地区曾经有一家国有废品回收站，1992年开始有回收从业者租用院落回收废品，规模日见增长；到世纪之交，因临近中关村和高校区的优势，形成了以电子垃圾为主，兼有其他各类废品的大型废品村，一度成为全北京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2009年，八家地区有电子废旧物品收购站点174家，从业人员2 000人左右；2009年，八家村拆迁，八家的废品市场也随之瓦解；但时至今日，在八家村附近仍有若干家残存的小型废品回收商户，八家村东侧的双清路北部路段被当地人称为“废品一条街”。

东小口村隶属昌平区东小口镇，位于北五环北侧5 km处，靠近北京市的出城主通道八达岭高速，南侧距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2 km。东小口的起步在2003年，最早由一家名为“福佑鑫源”的废品回收公司的老板向东小口村民以每亩13 000元的价格租用了60亩荒地，并按照不同的再生资源类型进行空间分区，以拆迁户为单位划分成200~300 m<sup>2</sup>的经营摊位，每个单位均建有50 m<sup>2</sup>左右的平房和100~200 m<sup>2</sup>的分拣场地，租给回收经营户。这种经营模式为流浪的回收业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吸引了大量租户。此后又有7家回收公司进驻，除了一家是北京本地人经营以外，其他均为资本较为雄厚的河南回收业者建立。凭借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东小口逐渐形成规模庞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回收纸张、塑料、金属、木材、家具、家电等各类再生资源。2009年金融危机前的黄金时期，东小口共有8个废品回收公司（站），1 000多个商户，从业者3万人（亦以河南人为主），年营业额达到数亿元<sup>①</sup>。东小口成为全北京最大的废品村，吸纳了全市接近三分之一的废品，在媒体话语中一度被称为“废城”。东小口甚至被看作是北京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2008年全球经济下滑时，其回收品贸易的不景气被看成经济增长乏力的某种反映。2011年，政府下令将东小口关停，东小口启动拆迁，但直至今日，仍有部分回收活动在东小口持续经营。

### 1.2 实体景观变迁

废品村内部的空间肌理不同于常见的住宅出租型城中村。后者因密集加盖板房而导致公共空间被过度挤占，居住人口密集，通道狭窄；而废品村与早期的浙江村类似，是生产活动与居住生活杂合的空间形态。由于废品经营需要相对开敞的空间用于仓储和分拣活动，货物的运输也需要相对宽

① “废品回收该何去何从”，见：<http://www.nu.ngo.cn/xxt/1252.html>。

敞的通道，因而废品村在城乡结合部的局部空间中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空间肌理——更接近一些村办工业小区的形态（图1）。而从图2的历史影像中可以看到，与早期分散租住农户的八家相比，通过改变空间经营模式，东小口的货场分布更加集中和整齐，规模扩大了近两倍，并且与周边村庄形成了



图1 废品市场的院落组织与院落空间（上图为七里渠废品市场的主通道，下图为东小口废品市场内一商户的院落）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注：在废品村的橘黄色框范围内，红色框内为大规模的核心废品市场，外围是普通农户地区，分散的个体废品回收从业者在此租院落，受雇于废品市场的从业者大多也在此租住。

图2 废品村时期的八家（上，2008年）与东小口（下，2011年）的空间形态

资料来源：以谷歌地球的历史图像为底图绘制

一定的区隔。随着时间推移，废品村的空间形态与内部功能组织在不断进行一种自我改良式的演化。

从运输方式来看，八家由于靠近城市中心，回收业者还是主要采用人力板车作为主要的运输工具，走街串巷地回收废品，在废品村内进行分拣拆解加工，或者直接运到八家附近的各类二手产品市场分类售卖；而东小口距离中心城较远，运输更多地依赖机动车。在东小口租住摊位的回收商户中，绝大多数是坐地收货的中间商，往往各自有相对固定联系的上游回收网络，往来于城市中心与废品村之间，将消费末端的废品流逐级汇集到这里。

## 2 废品村的空间再生产

### 2.1 废品村的空间迁移

八家与东小口的发展历程折射出废品村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具有普遍性的时空演变模式——不断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逐步向外迁移，但始终盘踞在城乡结合部的缝隙中，见缝插针地寻找生存的空间（图3）。

表1展示了京北几个典型“废品村”的空间迁移历程，八家和东小口是这个迁移轨迹中重要的两个节点。20世纪80年代，北京最大的废品市场位于现在的北四环边的海淀区卧虎桥村。1995年前后，因四环路的建设需要，卧虎桥被拆除，回收商户不得不另觅他处，当时已初具规模的八家村便提供了一个去处。大约在同一时期，卧虎桥北侧靠近北五环处，朝阳洼里乡的洼边村十四队注册成立了朝阳洼边废品收购站，也吸纳了许多原卧虎桥的回收商户，并逐渐发展为1990年代末北京最大的废品市场。洼里作为废品村的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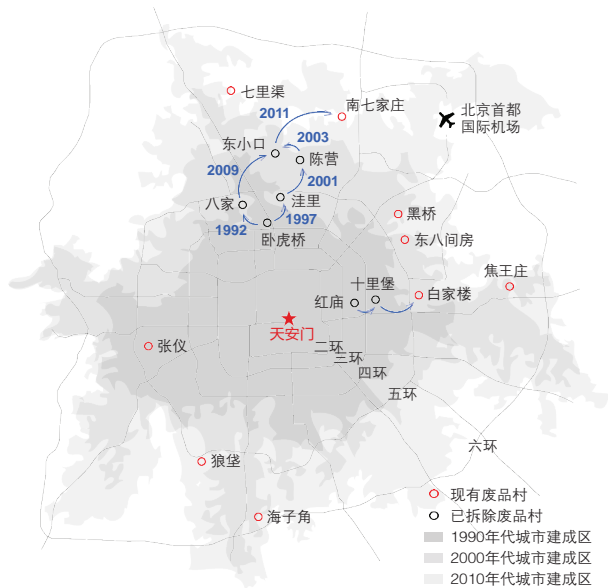


图3 北京市部分废品村的空间演变轨迹与城市建成区拓展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时间只有短短5年，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2年，奥运场馆正式选址洼里乡，洼里拆迁。部分商户找到了五环以北立水桥边的陈营村，但陈营的废品市场几乎是最短命的一个——2003年地铁五号线开始建设，沿线的陈营村拆迁。回收队伍再次北上，在东小口驻扎下来。东小口的特殊之处在于，由几个大废品公司的老板向东小口村租下土地，统一规划建设了标准化的摊位，再出租给在洼里和陈营已经建立合作关系的商户，形成了相对成熟、规范和规模化的运营。也是在这一年，海淀区将八家村划拨给清华大学作为发展预留用地，清华大学将之规划为教师住宅。2009年，八家村征地拆迁启动，2010年完成；今天，八家村原址上已建起了作为回迁安置房的八家嘉苑。八家拆迁后，少部分在周边地带未被拆迁的商户仍驻守维持运营，被拆迁的商户则另觅他处，其中就有一部分迁往了东小口。

东小口的废品回收业于2003—2008年因为北京市的大拆大建而快速发展。首先，建筑拆除下来的旧建材——钢筋、木材、塑料、废杂金属等——作为新建材的原料，供不应求，而回收业者成为从废品到产品之间的关键一环。其次，消费产品如废旧家电、废旧家具在这里也找到了更高回报的去向——涌入北京中低收入外来打工者的租房市场，带动了二手家电、家具的需求。废旧产品在这里经过清洗、维修和简单改造，可以收购价3~5倍的价格销售到二手商品市场中；无法维修的产品则被集中到东小口的一些专业电子废物处理商户手中，通过拆解分拣，按照废塑料、金属、线路板等类别销往北京以外的地区。规模效应带来了专业分工的利益，东小口在这一时期经历了高速的发展，成为内部高度专业分工、产品直销外地原料收购企业的大型再生资源集散市场。

2008年是东小口发展的拐点，一方面奥运会的举办减缓了城市拆迁建设的速度，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了原材料市场价格的下跌，都不同程度地波及了资源再生行业的效益，许多商户都感叹，“这几年废品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越来越严，而废品收购的价格却一路走低。尽管如此，真正的打击还是来自城市扩张本身，2011年已逐渐被城市建设用地包围的东小口村也开启了拆迁进程：在政府公布的《昌平区东小口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东小口村的土地都将转变为城镇用地。到今天，除了少数几个废品市场和若干商户还驻守原地以外，大部分的回收活动都在实体空间的拆除中消失。其中，最早落户在东小口的福佑鑫源公司是被拆除的市场之一，此后公司老板在更北侧的南七家庄村租到土地重新开设了市场，而其他被拆除的废品市场中亦有北上者，更有迁往朝阳区沙子营的远徙者，也有老板干脆退出了回收行业。废品市场中的废品经营者同样作出了分化的选择，大量商户追随原先的市场老板继续从事回收，其他则另觅市场、脱离市场单干或退出回收行业。在废品村的拆迁中，废品回收行业完成了一种空间和经济的有机重组，而这也正是历代废品市场在宏观的空间迁移中的内部组织演变过程。这一重组由掌握资本、资源和信息的废品市场老板们主导，以复制和改良上一个废品村的组织管理模式为路径。但普遍来看，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持续下滑和东小口长期积累的被破坏，此后重组的废品市场都不复东小口的规模和管理规范。

在废品村的时空演变中，形成了某种奇特的“退”与“守”的格局：不断被城市驱逐，让位于更有利可图的城市空间功能，又持续地驻扎于新的城市边界，在异地重建；节节后退，又步步驻守，形成了城市边缘—被驱赶—新的城市边缘的循环。每一次退守中的时空演变都是一次新的空间生产过程，在以废品市场老板为首的废品从业者与村委会的利益谋合下塑造了新的废品村空间。在这种看似重复的路径中，东小口所呈现出的某种自我优化和空间改良的努力，实在值得关注和反思。特别是与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循环经济型城市建设的努力相比，东小口走过的现实路径不应被简单忽略，而应透过景观变迁的表面现象，看到推动其发展演化的深层机制。

表1 京北废品村的空间迁移脉络

	二里庄	八家	洼里	陈营	东小口	南七家庄
空间位置	北四环边	北四环、北五环之间	北四环、北五环之间	北五环以北 3 km	北五环以北 4 km	北五环以北 7 km
起始时间	1980年代	1992年	1997年	2001年	2003年	2011年
终止时间	1995年	2010年	2002年	2003年	2011年开始拆迁	—
前废品村时代	农村	农村	农村	农村	农村	农村
废品村时代	1980年代北京最大的废品市场	北京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	1990年代末北京最大的废品市场	—	2003年以来北京最大的废品市场	—
后废品村时代	四环路	清华大学教师住宅、拆迁安置房	奥林匹克公园与场馆	地铁五号线立水桥站	城市新区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2.2 社会空间——同乡网络的嵌入

废品村的存在有其经济利益的基础，但密切的同乡网络是塑造废品村社会空间的重要力量。北京有 90% 的资源回收业者来自河南的固始及周边地区，同乡网络为外来者进入城市 and 这个行业提供了联系渠道，同时也是市场信息的传播途径。在废品村中，家族经营成为最普遍的组织方式，往往串联起社区回收、分拣和销售，甚至北京以外的深加工处理厂；河南话成为村里的主流语言；同乡开办的“北京—固始”长途班车是联系北京与故乡的纽带；村里的打工子弟学校从校长、教师到学生都来自固始本土。在晚饭时间，村边会准时出现河南口味的临时菜市场一条街；村边的“固始鹅块火锅城”里有地道的家乡味，这类挂着“固始鹅块”招牌的小饭馆几乎只有来自固始及周边地区的人才会光顾，也因此几乎与废品村相伴共生（图 4）。

可以说，来自河南的废品回收从业者在废品村的实体空间内再造了一个家乡，使得废品村呈现出更强烈的半城（北京的城）半乡（北京的乡与河南的乡）景观，而这一景观对废品村的从业人员而言具有不同的空间表征，为回收者提供了新的身份认知与社会认同，形成了一种循环的空间再生产过程。同乡网络嵌入实体空间，再造了实体空间的社会性，社会空间又反作用于同乡网络，使其通过就业、交易等种种经济联系固化了生活在其中的群体的职业活动和所属的社会等级。这个过程使得废品村在内部高度一致，却与周围环境形成剧烈反差，成为一种破碎的、异质化的社会景观，如同一片特殊的“飞地”<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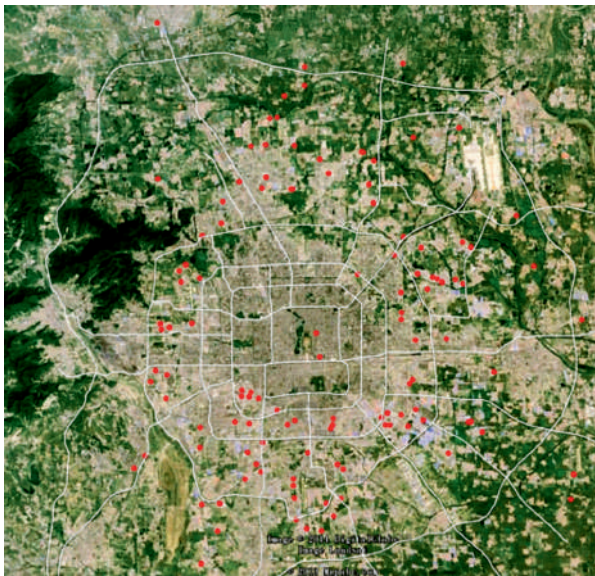


图 4 北京市固始鹅块餐馆分布  
资料来源：通过谷歌地图搜索“固始鹅块”处理得到

## 2.3 理想空间——规划改善的努力与挫折

废品村的问题早在世纪之交就已经引起北京市规划部门的关注，废品村的环境质量和公共管理是其备受诟病的主要问题。废品堆放和拆解活动使得废品村普遍呈现出脏乱的特征，扬尘、废水、异味和潜在污染排放影响着废品村内和周边地区的环境质量，引起当地村民、村庄中其他租户和周围居民对废品村的反感。为了整顿散落在城乡结合部数量惊人的废品村，北京市于 2004 年发布了《北京市再生资源集散市场发展规划》<sup>[10]</sup>。根据当时的规划调查，北京城区周边“有再生资源集散市场 121 家，总面积约 753 亩，集中在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区的城乡结合部”。为了规范再生资源市场，特别是改善其中的环境卫生与治安状况，城市管理部门计划用 20 个集中的大规模专业化拆解场取代分散的废品村，通过配备自动化分拣设备，减少这个行业对劳动力的依赖。同时，在全市居住社区建设统一的回收亭，并配备再生资源回收的专业化运输体系（图 5）。

然而规划改善的努力在现实中遇到了强大阻力，正规的再生资源企业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主要的回收工作仍然依靠非正式的回收业者。真正的竞争差别源于从业者的身份，使得正规的再生资源企业仍然不得不依赖非正式的回收网络——由于福利保障的高昂价格，正规企业雇佣工人进行回收的成本远远高于外包给非正式回收业者。一家



注：上图为朝阳区黑桥村，村庄西侧出租为废品市场；下图为海淀回收公司下属的韩家川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图 5 废品村与正规回收设施的对比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

再生资源企业管理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市场策略：“我们希望能够统货不统人”。从经营者的利益来说，控制货源才是目标，一旦涉及正式雇员，经营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从外来非正式的回收业者角度而言，被雇佣也并非他们所期待的，“有货在手，找到下家就能自己挣钱……在这个行业里做久了，价钱和下家都熟悉，谁出价高就卖给谁……来北京不为别的，就为多挣几个钱，好在老家买房子”。为自己劳动的回收业者更加能够忍受艰辛的劳动、恶劣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以及身在异乡、身处底层所面临的一切艰难。这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外来回收业者，努力看管自己的货物，搜索和挖掘货物增值的潜在机会，而这些是正规化的回收业所无法做到的。

再生资源本身的市场价值并不足以支撑其按照城市规划管理者期望的改造升级目标进行新的场地建设和设备升级。拥有资本投入能力的正规再生资源企业，强调这一行业的公益性，因此需要政府授予垄断经营权。然而政府从环境影响评价和吸纳劳动就业的角度，还是将具有一定盈利能力的资源再生行业与更加紧迫的城市垃圾处理（垃圾焚烧、填埋等基础设施）区分开来，将资源再生行业留给市场去解决。2008年以前再生资源市场的繁荣创造了一些靠经营再生资源回收发财致富的神话，东小口相对八家的空间改善可以看作在这种神话的诱导下，回收业者尝试通过自组织获得城市认可的一种努力：尽管从村集体租借的土地仍然不具有合法性和长期保障，但无论承建大规模回收场的回收公司，还是小规模租住摊位的经营户，均对生产环境和设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资和改善；一些从业者还对政府计划兴建大规模专业化拆解场的想法很感兴趣。然而，外来回收从业者并未获得与本地再生资源主体企业同等的投资主体资格。废品回收业者初级的自组织和自我完善随着再生资源市场繁荣的结束也面临瓦解。

### 3 空间生产背后的博弈

废品村的空间塑造显示了外来回收从业者与本地城市管理者及居民等多重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不同主体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对于空间改造的方向、目的和价值判断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有时甚至是对立。

塑造废品村的最大力量来自数量众多的外来回收从业者。他们通过废品村的空间选址、土地租赁、市场建设、日常运营与日常生活直接构建了废品村的微观空间形态与宏观空间格局。回收业者内部逐步形成了社会等级的分化，一些资本积累较为雄厚的回收业者上升为租地建场的“老板”，这些老板通过与当地村委会、工商、治安、消防等管理部门建立良好关系来维系废品村的生存；而更底层的商户和雇工

则依靠废品村提供的空间庇护，靠辛苦劳作维系其在城市中的经营与生活。

城市管理者与本地居民对于如何处理废品村处于两难境地——废品村的环境和社会治安对所在区域来说存在负的外部性，但其提供的废品回收处理服务又具有某种正的外部性。城乡二元化的管理模式限制了地方政府对废品村的有效管理。村委会通过出租土地给废品市场的经营者获得经济收益，村庄的原住民通过出租房屋给回收商户的雇工或者个体工商户获得经济收益。考虑到村民的绝对数量显著低于回收从业者，真正承担废品村低劣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和脏乱环境的，恰恰是那些租住的外来回收从业者。

关于废品村的一切争议伴随地块的开发价值提升而逐渐发酵。20世纪90年代，城市边缘土地再开发价值尚不显著时，村民对城市生活抱有期待，废品村只不过是一些缺少其他致富途径的村庄别无选择的副业，因此其拆迁顺遂民意，也较少受到抵制。分散的回收业者更加没有发言的机会，只能选择迁移。然而，随着土地再开发价值的提升，村民对再开发补偿的期待越来越高，废品村成为拆迁讨价还价过程中一个等待的过渡阶段。城乡二元化的发展模式，使得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土地无法获得有效的资本投入，实现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民间的逐利行为在知道自己只是获得短期默许的情况下，加剧了对空间的掠夺，无论村民还是回收业者都只想在拆迁前尽量多挣一点钱，没有人愿意为公共物品和环境的建设持续追加投入资本。公共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强化了再开发的正当性，然而只有在房地产市场开发的商业前景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这种正当性才足以构成废品村拆迁改造的理由。

正是这种权力与资本的博弈，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甚至是文化与情感体验，共同塑造了废品村这一特殊的城市空间，而它的空间也改变了地方景观。百余个废品村散布在北京市的城乡结合部，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城市面貌，但它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分享城市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却受到城市排挤，要为自身生存空间抗争。它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参与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并参与城市空间的重构。它几乎是一种正式城市化的先导，因此只能是非正式城市化，或者说“灰色城市化”。

### 4 结论：废品村的转型与重塑

解决废品村的外部性问题是城市管理无法回避的任务。对于以空间分配为核心任务的传统物质规划实践来说，城市垃圾处理相关的公共设施布局，持续面临邻避（NIMBY）和经济效率的双重困境。这一矛盾在过去几年中日益激化，

全国有 30 多个城市发生了居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远有广州的 30 万番禺居民“散步”，近有北京的六里屯万人上书<sup>①</sup>和阿苏卫九四事件<sup>②</sup>，正规的垃圾处理设施迟迟难以落地。同时，基于循环经济理念下的系统改革构想，也面临实施困难。在北京市实践过的若干个循环经济试点方案中，普遍因为缺少消费者的积极参与，以及经营者经济效益低下，难以与废品村的非正式回收体系竞争。

在正规化体系的建设不断受阻的同时，回收从业者也开始为废品行业的续存谋求支持。2012 年年底东小口拆迁时，中海融通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老板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拍摄了纪录片《亿元废品村》<sup>[11]</sup>，讲述废品回收为城市作出的贡献，以及东小口面临的困境，并为新的废品市场选址争取民众和官方的支持。这是废品从业者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主动为生存争取话语权。2014 年 1 月，央视在此基础上播出了一部关于东小口的纪录片——《废品村纪事》<sup>[12]</sup>，从官方角度解读了废品村拆迁对从业者造成的影响，也反映出废品村的转型与改造正在进入主流视野，获取社会的关注。

从以往城乡结合部发展的历程来看，被关注的效果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能引来公共部门的强力介入，通过大拆大建快速改变旧有面貌，实现从“村”到“城”的跨越性转变；另一方面也会对当地已经形成的经济社会体系造成冲击，直接影响当地从业者的生计。这在北京浙江村的发展演变历史中有过深入的探讨。借鉴浙江村的历史，民营的小手工业者在浙江村的改造过程中，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身份转变，浙江村的空间实体已经不再具有“城”——“乡”桥梁的社会意义。但对于“废品村”而言，这样的转变尚未起步。从八家到东小口，因为废品回收行业的边缘性，废品村依然是特殊的“灰色”空间，承载着最底层的外来人口在城市谋生发展的绝望与希望。废品村的变迁所展现的灰色空间的生产过程处处展现着资本运动塑造景观实体的内在机制，交织着不同主体对这一空间的社会身份认同与想象，仅仅通过拆迁的方式来消除这样的空间是不可能的。未来的转型方向必将超越废品村本身，而延伸至整个城市的转型与重构，包括对资源再生活动的公共价值的再评估、生产与消费模式转变等等，其根本在于将最底层的外来回收业者纳入以人为核心的环境正义的城市发展诉求之中。UPI

## 参考文献

- [1] 顾朝林,熊江波.简论城市边缘区研究[J].地理研究,1989(03):95-101.
- [2] 顾朝林,陈田,丁金宏,虞蔚.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特性研究[J].地理学报,1993,48(4):317-328.
- [3] 刘海泳,顾朝林.北京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功能[J].地理科学,1999(06):497-503.
- [4] 刘贵利,顾朝林.城市社区与流动人口聚落的生态关系及其调控——以北京市为例[J].人文地理,2000(02):24-26.
- [5] 邱友良,陈良.外来人口聚集区土地利用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J].城市规划,1999(04):18-22.
- [6] 周大鸣,高崇.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 50 年的变迁[J].社会学研究,2001(04):99-108.
- [7]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8] 唐灿,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社会学研究,2000(04):72-85.
- [9] Henry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lated by Nicholson Smith D.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1991.
- [10]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再生资源集散市场发展规划[R].2004.
- [11] 真实第 25 小时.亿元废品村[EB/OL].真实传媒,2012.  
<http://www.wasu.cn/Play/show/id/1253736>.
- [12] 讲述.废品村纪事[EB/OL].中央电视台,2014-01-14.  
<http://v.ifeng.com/documentary/society/2014001/037f77e2-b690-4181-bf32-d46bf3d295f0.shtml>.

(本文编辑:王枫)

① 2004 年海淀区规划于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增建垃圾焚烧发电厂,2007 年六里屯居民递交《要求停建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或另行选址的万民请愿书》。

② 2009 年 9 月 4 日,数名来自阿苏卫周边地区的居民到“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举办地农展馆门前打出条幅,反对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冲突。资料来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55574>。